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1.05.0015

多丽丝·莱辛的种族歧视思想

——《野草在歌唱》的叙事裂缝解析*

陶淑琴^{1,2}

(1.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2. 贵州财经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 贵阳 550003)

摘要:英国文学家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一直被读者解读为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歧视的进步文本。但是,小说叙事中存在的三处裂缝,却暴露了作家的真实立场。透过主观评论与客观描述的裂缝、偶像之建构与解构的裂缝和白人女性玛丽形象的裂缝,我们能发现莱辛的立场是宣扬种族歧视的,由于她出身白人殖民统治者阶层,她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烙印。

关键词:野草在歌唱;多丽丝·莱辛;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叙事裂缝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1)05-0101-08

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笔耕不辍,多年来发表了十多部(篇)中长篇小说,且有大量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等作品问世,是一个多产作家。因为“其将自己的怀疑,激情以及幻想投入在对分裂的文明的审视上”,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迄今为止,她尝试了多种文体写作,试验了多种文学风格,创作题材丰富多变,加上她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她毫无悬念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于1950年发表后就获得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欢迎和一致好评,奠定了她在当代世界文坛的重要地位。在获诺奖后的采访中,作家仍坦言她对这部作品的喜爱:“我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仍然具有活力。”^[1]读者和评论者一向认为这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殖民地土著人的苦难生活,尤其是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成功的黑人摩西的形

象,表达了对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强烈谴责。“早在1956年,王蕾先生就翻译了《野草在歌唱》。这是由于《野草在歌唱》被视为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典范之作,并且当时的苏联政府对莱辛的政治信仰颇为欣赏。”^[2]“小说也的确写了殖民主义的罪恶、种族歧视的事实、‘穷白人’的生存不易与‘女性’生存境况的艰难等等。”^[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莱辛在小说中以充满人道的理解和同情,把黑人视作和白人一样具有爱憎感情的人来描写。而在以前一些以非洲为题材的小说中,黑人大多被丑化成懒惰愚昧、听任宰割的可怜虫。摩西的形象在小说中没有被简单地面具化,虽然莱辛没有像描写玛丽那样描写他的心理活动,但是他的言语举止使我们从不同的侧面比较完整地看到了一个具有个性的黑人。”^[4]序言作品的确提供了这样解读的可能性,

* [收稿日期]2011-05-21

[作者简介]陶淑琴(1974—),女,侗族,贵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贵州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读者在小说中看到了一个与以往文本中的殖民地黑人不同的形象,他似乎是正面积极的黑人形象,有正义感的读者因为莱辛背弃自己的殖民统治阶层,转为殖民地人民说话感到由衷的高兴,欧洲读者也因为她提供了真实的非洲景象而激动,在大家一致为莱辛的勇敢叫好,并为她的成功欢呼的时候,并没有人去深究文本隐藏着完全不同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无意识。

固然,作品中处处都是为黑人鸣不平的声音,作家对于种族歧视制度的揭示和愤慨也溢于言表,她貌似真诚地从态度上表达了一种要把黑人当人的人道情怀。但是,海德格尔对“所处位置”的重视,多少说明了问题的本质。^[5]作为一个从小就在非洲长大的白人,她的生活中时刻充斥着种族歧视的文化氛围。也许她真诚地打算严厉审视并否定种族歧视制度,但她却无力在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双重支持下,反过来反对自己赖以生存并形成思想的基础。正如她的创作所遭遇的另一个悖论:她曾在多部作品中质疑语言的可靠性,最终却不得不承认,由于对语言的反抗必须依靠语言的支持,这种反抗注定是失败的。虽然她公开表达反对种族歧视的人道立场,但是文本却真实地暴露了她对种族歧视的宣扬。通过研究《野草在歌唱》文本,我在这部小说中发现了三处具有重要意义的叙事裂缝。透过这三处叙事裂缝,我们能更真实地认清莱辛的殖民主义立场和她对种族歧视观念的维护。

一、主观评论与客观描述的裂缝

从叙事学角度说,这部小说属于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第三人称叙事又称为全知叙事,其特点是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可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事:既可高高在上地鸟瞰概貌,也可看到在不同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视人物的内心。在全知叙述中,不少作者常常通过叙述者之口对人物、事件、甚至自己的当下创作发表公开评论。如果第三人称叙事再配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那么这样的评论一般拥有绝对可信性,除非全知叙述者将自己或多或少地“个性化”或人物化时,这种可信性才

会被削弱。翻开《野草在歌唱》,读者随处都能看到作家不加掩饰地发表的关于种族歧视的言论,态度激烈,以一种冷嘲热讽的口吻说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国各地的人们一定都看了一下这一段标题触目惊心的报道,都未免感到有些气愤。气愤之中又夹杂着一种几乎是得意的心情,好像某种想法得到了证实,就好像某件事正如预期的那样发生了。每逢土著黑人犯了盗窃、谋杀或是强奸罪,白人就会有这种感觉。^[4]

是的,他是无足轻重的,他是个黑人,一有机会就要偷窃、强奸或是谋杀,一辈子也改不了这种本性。^{[4]20}

小说中类似的评论与语气俯拾即是。

这些明显的嘲讽,似乎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作者的对种族歧视的质疑,读者通过这些信息得出的判断是:作家的立场是反对种族歧视。除此之外,作家也扔给读者一个期待:作品中将会不带偏见地写出一个真实的殖民地黑人,他具有白人具有的所有优点,没有种族歧视制度的偏见强加于黑人的种种缺点。这个真实的殖民地黑人就是摩西。

作家直接发出的评论,不仅会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而且会影响读者的情感倾向与道德判断。但是,如果这些评论与文本叙述者的立场相悖,其信用就应当受到置疑或者否定。“确实如此,大多数非常可信的叙述者喜欢作大量附带的冷嘲热讽,因而,就其存在着潜在的欺骗而言,他们是‘不可信的’。”^[6]

莱辛的这部小说以平静而不动声色的叙事,给读者留下一种客观真实的阅读感受。尽管叙事人主要是从玛丽的角度进行叙事,但她明显不是玛丽的代言人,叙述者这种看似超然于人物之外的叙事技巧,使她成为“可靠的叙事者”。文本清楚地表明,在黑人男仆与白人女主人的关系中,是黑人摩西在掌握着白人玛丽,他利用玛丽对他的恐惧心理,任意而傲慢地摆布她。读者看到的摩西是一个城府很深,工于心计的强者,而且有一点强者的无赖:在玛丽急需一个精神支柱以活下去时,他适时地占据了她的心灵。从这里,我们能够

解读出作家对黑人摩西的真实评价:卑鄙下流。

她的面色显得那么可怜,一双眼睛像是两个痛苦的窟窿。“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弄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呢?我并不是有意叫它发生的。可是他始终不走,他始终不走。”^{[4]202}

这时他(指托尼。本文作者注。)觉得身后有什么动静,便立刻转过身去,只见那个佣人摩西站在门口望着他们俩,脸色极其恶毒。^{[4]202}

上面的引文中,玛丽说“我并不是有意”,从前面她种种精神上的失常与紊乱现象看,读者会相信她的行为是不由自主的,是无意的;而“他始终不走”这句话重复了三次,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摩西是有意的。从玛丽一向的精神状态看,她不会撒谎。因此,悲剧之所以发生都是摩西故意为之。而且,在托尼这个刚到非洲不久,满怀种族平等的正义感情的青年眼中,黑人摩西的“脸色极其恶毒”,而且他觉得摩西恶毒的感受在后文中多次出现。当读者想到托尼对种族歧视的深深反感时,就会相信他对摩西的感觉是公正的,客观的,他不会先入为主地对摩西产生恶感。因此,作家又一次巧妙地表达了她的种族观:白人优越,黑人卑鄙。

他一直对玛丽很和善,没有谴责过她。突然之间,她发现自己心里老是想着他,怎么也摆脱不掉他的形象。他会搭救她的!她要等着他回来。她站在门口,俯瞰着那一片干枯凋萎的草原。他一定在树林里的什么地方等待着;而那个年轻小伙子一定在草原上的什么地方,天黑以前就会来救她。^{[4]214}(引文中的重点号为作品原有。)

这段引文很明白地表达了一个意思:玛丽不幸落入了摩西的手中,必须有人来搭救她出去。当然后面的叙事也印证了玛丽的这一预感。实际上,搭救一词在玛丽的心理上更多地并不指肉身的危险,她更想暗示精神上的危机需要搭救。那么,读者曾经认为是摩西把玛丽从精神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现在看来,这种感觉完全错误。摩西不是玛丽的精神救主,而是她的精神杀手。

她想,她得独自走完人生的道路。这是她必须吸取的一个教训。如果她早就吸取了这个教训,那她现在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不会第二次表现

出意志薄弱,去依赖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了。^{[4]217}

“不值得信任的人”,不用明说,读者也知道是指摩西。因此,摩西的本质,就此确定。实际上,这种对非洲土著黑人不动声色的妖魔化方法,与让人一眼看穿的妖魔化手法相比,更加高明,也更加有效。

作品的公开表态与客观叙事存在巨大的裂缝,这使作家的真正立场暴露无遗。虽然莱辛高调宣示反对种族歧视,然而作品本身的叙事,使细心的读者体会到,作家公开表明态度,和她通过人物塑造所传达出来的态度是完全不一致的。这暗合了一个叙事学上的悖论:滑稽模仿具有被指认为真诚叙事的危险。因此,莱辛的冷嘲热讽可能是真诚叙事。她通过冷嘲热讽暗示读者,土著黑人并非像白人想象的那样坏;她又通过细致的叙事向读者证实,黑人的确象白人想象的那样坏。“假如玛丽·特纳的叙述终极目的是死亡,以示对她的异端进行惩罚,那么摩西的叙述终极目的就是谋杀者,以实现他的本质。”^[7]“摩西的个性和谋杀动机都令人费解。……摩西从善良的教会男孩到谋杀者,其间的跳跃不能让人信服,叙事发展没有证明这一行为的正当性。”^[8]由此可知,作者是在宣扬种族歧视的合理性,而不是在批判种族歧视的非人道非正义。

二、偶像之建构与解构间的裂缝

小说中,为了把摩西塑造为一个与众不同的黑人形象,以达到对以往西方文艺作品对黑人妖魔化处理的一种反拨,作者故意明显拔高了摩西的形象。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丑陋、懒惰、无赖的黑人,而是一个能干、勤劳、善良的黑人。他对玛丽的不幸深表同情,宽恕了玛丽以前对自己的粗暴和残忍,这些行为体现了基督似的仁慈之爱,使他显得象精神教父一样伟大。

“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了。”^{[4]148}

“他很干净,做事也主动。在我那些雇工中,他是最好的一个。”^{[4]149}

“像他一样出身的人,我只碰到过他一个正派的。”^{[4]164}

这是玛丽的丈夫迪克·特纳对摩西的评价。

摩西的能干与聪明,是作品中所有人物公认的。虽然对他“正派”的评价,仅此一处,但迪克本身的道德品质为他的评价作了可靠性担保。其他白人具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观,迪克虽然经营农场不善,却是一个正直的白人农场主,而且对殖民地黑人劳工,除了当作必须依靠的发财工具外,他也怀有更仁慈的关心。这也反过来解释了,在迪克身患重病卧床不起时,他是出于忠心,自愿留下来守候在主人的病房外,义务帮助无助的女主人照顾迪克,而不是象如玛丽所“期望”的那样,对她心怀不轨。

在与玛丽的关系中,摩西是一个矛盾的形象。从叙述的内容来看,客观上,摩西一直在精神上安慰玛丽,在家务事上从不要玛丽操心,担任了玛丽的精神导师和救世者角色。不过,在玛丽的心中,他虽然是精神依靠,却也是心理深处的不断重复的噩梦。从他走进家门为她做家仆开始,玛丽始终对他心怀恐惧。这是因为他们初次相逢时,她对摩西不公正的鞭打。在后来的相处中,她直觉地感到摩西身上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让她不由自主地心生恐惧。他的能干,他的聪明,他的见识,都对她构成了深深的威胁。她害怕摩西的报复。但后来的事实说明,摩西非但没有报复她,反而在她精神濒临崩溃时给了她最坚定的理解和支持,他以慈父般的关怀使玛丽已然枯萎的生命之花再度焕发生机。其他仆人都因玛丽的苛刻和神经质而辞职不干,摩西在了解了玛丽的真实困境后,却毅然留下来。他是一个放弃正当复仇要求,反而对仇人以德报怨的黑人男性,从人性上说,他远比乘人之危想鲸吞他们农场的白人男性查理·斯特莱道德高尚;同时,他对艰难人生坚忍顽强的忍耐,对玛丽生存之痛的理解和安慰,与玛丽的丈夫白人男性迪克·特纳懦弱无能相比,更够得上男子汉的形象。

此外,摩西与一般殖民地黑人不同,他有自尊心,有一定的文化,懂得反思自我的身份和地位的不公平,要求女主人把他当“人”尊重,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宽容,慈爱,以德报怨。这与以往文艺作品中黑人要么穷凶极恶,要么卑琐懦弱,要么阴险狡诈的形象大相径庭。从某种程度上讲,无论

是体格还是精神,无论讲能力还是道德,他不仅是黑人中的佼佼者,即使站在白人中,也是很出色的。但正因为此,他可以是英国人,可以是法国人,可以是任何人,却恰恰不可能是黑人。

那么,摩西是谁?

摩西这一名字,最早出现在典籍《圣经》之《出埃及记》中。他是一个犹太人英雄,带领广大被埃及人奴役的犹太人走出埃及,因而他象征的是苦难生活的解救者与精神困惑时的带路人。在《野草在歌唱》中,莱辛解构了摩西的解救者意象:玛丽的悲剧说明摩西不仅救不了白人,相反会陷白人于地狱。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整个欧洲大陆造成了极大的物质破坏和人员伤亡,欧洲人民经受了极度的精神痛苦,西方中心价值观有所动摇,知识分子纷纷为精神的迷乱寻找良方,一度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古老的东方文明,其中包括非洲文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莱辛写作了《野草在歌唱》,否定了向东方古老文明寻求精神解救良方的可能性。

《野草在歌唱》中摩西的身份是一个谜。他来自何方?经历过什么?性格和爱好是什么?家庭背景是什么样的?这一切,作家都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好长时间我都为摩西的形象塑造感到遗憾,因为他更主要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人物。……但现在我又改变看法了。我认为那是描写摩西的正确方法,因为如果我把他塑造得更个性化一些,就会破坏这部作品的平衡。”^[9]这说明作家是特意把摩西处理成一个隐喻性存在,而不是真实性存在。就连摩西这个名字本身,都是可疑的,不能说明他的身份。“他的名字,当然来源于白人本身。”^[10]在小说中,他始终是一个被白人审视、比较并表述的他者形象,失去了主体性,也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形象应有的全部意义:他者永远在主体的对面,他者永远只是镜子。“现在,存在者被放在人面前,像是客体的和可以被支配的。”^[11]“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12]作家通过摩西这一形象,为白人种族树立了一面认识自我的镜子——当然镜子中反映出来的还是白人。

小说曾指出,白人不相信黑人能拥有白人的

德行。小说通过“否定之否定”，隐晦地肯定了这一命题：首先，把“白人的”德行（敢作敢当）赋予了“黑人”，否定了白人的判断；然后命名这个黑人为“摩西”，一个典型的白人名字，否定他的黑人身份。因为没有任何命名行为是无政治意义的，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来说，命名等于身份，“所指物及其表达（能指）被看作是直接相关联的；话语功能只限定在现实的表达面内。”^[13]但在莱辛的小说中，这一能指与所指之间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缝，结果只能以否定其中一项来达成真正的理解。而否定其中任何一项都构成了对摩西黑人偶像的直接解构。因此，无论摩西的形象有多高大，他都是一个被抽空了真实内容的象征，加在他身上的一切美德都是无根的，这就间接否定了在他身上存在美德的可能性。甚至，他的形象越是高大，对黑人的讽刺就越辛辣。莱辛以摩西毁灭他人同时也毁灭自己的行为结束了整篇小说，隐喻地告诉所有世人，想依靠黑人走出精神困境，不仅不可能，还会导致更大的悲剧。莱辛认为，在西方社会陷于精神迷茫的歧路时，试图从东方思想中寻找救世良方注定只能是失败的闹剧。

由此可知，摩西形象内含对自身的解构。通过这些处理，摩西形象与黑人偶像之间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缝。透过这一裂缝，我们能够发现作家创作中深藏的种族歧视观，她的根深蒂固的白人优越观。

三、玛丽形象之叙事分裂

《野草在歌唱》中，虽然人物众多，但最着力刻画的形象是玛丽。玛丽是一个生长在殖民地的白人女性，家境贫困，甚至和富裕的黑人家庭差不多。但是出于白人优越的血统论，在非洲殖民地，玛丽及其家人都感到他们高黑人一等。这样，他们实际上生活在一种精神矛盾中：面对白人，他们感到无比自卑，面对黑人，他们又感到极度自豪。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自我感觉良好又是他们人生中的另一悖论，而且这双重悖论一直伴随玛丽一生。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矛盾的生存方式，使玛丽从精神到肉体都显得变态。她不能正常恋爱结婚，最后出于舆论压力和迪克匆匆结婚；她不能正视自己的处境，面对白人女性主动提供的友

好支持和帮助，她报以最无礼的傲慢和轻蔑；面对地位比自己低贱得多的黑人仆人，她百般挑剔，发泄内心的不满和压抑，并在黑人仆人无奈的服从中获得病态的心理满足。这是一个有着严重心理疾患的白人女性，无论作家如何使用各种心理描写手法让读者走入玛丽的内心世界，从而对她产生深深的同情，但是自始至终，作家本人对玛丽的态度却是冷漠的，甚或是鄙视的（颇有一点怒其不争的感觉？！）。

尽管玛丽不可爱，但她却道德高尚。然而叙述者对她的态度是又讨厌，又同情；读者对她的态度同样是又讨厌又同情，只有摩西，作者一心塑造“真实的”黑人偶像对玛丽着了迷，最后甚至为她犯罪。

小说开始就展现了玛丽尸体的令人讨厌，比如饿狗舔尸，尸身的委琐，令人厌恶的恶臭等，塑造了一个令人极度厌恶的女性形象。然后，通过描述玛丽一系列神经质的、可怜、可叹、可恨又可恶的行为，强化了读者对她的讨厌感。最后，作者交代了玛丽的出身环境，解释了玛丽现在的状况事出有因，因此，就在这里，莱辛高明地玩了一个叙事技巧，偷换了种族伤害的施者与受者：种族歧视的真正受害者倒成了白人而不是黑人。因为玛丽受过教育，能够感受到处境的不幸，因而，她的身心双重困境更激起了同样受过教育的读者的同情。相反，真正遭受种族歧视最大伤害的黑人妇女，在莱辛的笔下却是一群无知无识的动物：迪克家庄上的黑人妇女们都很愚蠢，对自己的处境浑然不觉，她们抚摸玛丽的商品时的表情，把她们的无知和愚蠢显露无遗。不过，尽管玛丽可能激起读者对她的同情，却决不会激起读者对她的爱。然而在莱辛的笔下，最优秀的黑人男性摩西却对她爱得死心塌地，最后为她葬送了自己的人生。仅从男女两性的角色上看，摩西极富男性魅力，而玛丽则没有一点女人味。最优秀的黑人男性爱上最糟糕的白人女性，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情节设计？难道只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不，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作家的种族观和价值判断。

玛丽是一个精神脆弱的女性，但是，她拥有白人最引以为豪的美德：诚实。她尽管对黑人苛刻，

鄙视,但她不屑于撒谎。即使在她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时,她也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即使对迪克,她在精神上也从不妥协。因此,玛丽临死前对摩西的控诉就成了最有说服力的证言。因为无论何人,其无意识的意识流动应当是最真实的心理状态,所以玛丽临死前的意识流可视为她最真实的感受。从莱辛的多部作品和她的自传中我们知道,她对弗洛伊德、荣格、兰恩等心理分析学说非常信服,并且在后来的多部作品中直接宣扬了这些心理学说,如《简述下地狱》和《南船星系的老人星座:档案》系列小说。因此,她有意识地在《野草在歌唱》中使用意识流手法,明白并期待《野草在歌唱》中玛丽的意识流描写具有特定的意义和效果。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弄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呢?我并不是有意叫它发生的。可是他始终不走,他始终不走。”^{[4] 202}

“她想,她得独自走完人生的道路。这是她必须吸取的一个教训。如果她早就吸取了这个教训,那她现在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不会第二次表现出意志薄弱,去依赖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了。”^{[4] 217}

但是,同样可信的还有作为文本基础的大量事实描述,而这些事实描述却与玛丽的意识流相矛盾,这就造成了玛丽的形象裂缝。审视玛丽和摩西的关系,如果真有所谓引诱和被引诱的角色,那么,充当引诱者的应当是玛丽。从她的童年时代起,因为她感觉到的父亲的性引诱(父亲对年幼的玛丽性引诱与否,读者无从得知),使她对一切男性产生了怀疑,似乎所有的男性都对她有“性”趣,所以,偶然间摩西冲澡时裸露的后背,也被她当作性引诱信号解读。而迪克生病时摩西主动要求留下来照顾,也被玛丽当成了摩西心怀不轨。文本事实是玛丽因为害怕迪克埋怨而一再恳求摩西留下来,最后却被玛丽表达为是摩西“始终不走”。

在阅读《野草在歌唱》过程中,作为读者,我们被玛丽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深深打动,既使她不可爱,她依然是可怜的,她始终牵动着我们的心,使我们为她不幸的命运而长久叹息。正是作家的

不动声色看似冷静的叙述,让我们完全放松了警惕,接受了作家无声地传达给我们的信息:玛丽很可怜,作为白人,她更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自然,就文本的叙述而言,我们完全认可这种说法,把玛丽当作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故事的发生地是在殖民地,而且当时尚有许多殖民地人民正处于白人的残酷剥削下,正处于水深火热的生存斗争中时;当另一个当事人——他应该承担种族歧视的最严重后果,黑人摩西的痛苦被完全漠视,以至于他和他所代表的人民与文明完全成为一个装饰玛丽悲剧的背景时;当白人的痛苦被无限扩大,黑人的痛苦被无限缩小时,我们对作家文本中显眼张贴的“反种族歧视”标签不会产生怀疑吗?!

透过玛丽形象的裂缝,读者能感觉到作者对玛丽过分的宽容与同情。本来已经极度厌倦生活,多次在精神上慢性自杀的玛丽,在临死前的意识流里回味了自己一生的美好时光,心中燃起了对开始新生活的渴望,对天边一缕美丽霞光的无限留恋,却被摩西邪恶的双手戛然结束了生命,颇有欧·亨利式结尾的力量,直接代表白人有力地控诉了黑人对白人生命权的肆意践踏和粗暴剥夺。读者在同情玛丽的时候,其判断是非的立场也在不经意间转到了白人立场,而深切痛恨摩西的残忍和罪恶。但这是对黑人的严重不公与歪曲,它雄辩地说明了莱辛的殖民主义者立场和种族歧视观。

四、结语

莱辛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自传性的,许多都来源于她在非洲的生活经历——她生于伊朗,长于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她关注自己童年的记忆和她所深深介入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她的写作总是和文化冲突、种族不平等和个体人格中对立因素的撞击有关。在《野草在歌唱》中,我们几乎可以从玛丽的整个一生看出当初作者自身所处的环境:物质上贫穷得和土人没区别,但心理上却高贵得需土人仰视。自小就被教导土著黑人是下流的,必须与土著黑人在一切方面都区分开来,隔离开来。玛丽所受的教育事实上就是作家在非洲时所受的教育,这种充斥于所有时空的种族歧

视的教育,对作家的人生观与种族观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她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认识到了事情的真相,也相当真诚地清算自己的种族歧视观点,但是,这种深深地浸入她血液的种族观,已经不是她想清除就能清除得了的,它如此牢固地盘踞于她的大脑中,已经成为她无意识的一部分。更何况,她始终没忘记自己的白人身份:非洲的殖民主阶层。正如萨义德所说,“……如果我们相信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永远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作为人类社会之一员的生产者与其自身生活环境之间的联系,那么,对于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他也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着重符号原著作者加。)现实环境: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架子。它曾经意味着而且仍然意味着你会意识到——不管是多么含糊地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在东方具有确定利益的强国。”^[14]早有论者注意到,“莱辛打算在《暴力的孩子》中对南罗德西亚进行寓言化叙事,暗示了她希望制造一个面具,以美化或虚构英国帝国主义在非洲的经济和文化现实。”^[15]

在《野草在歌唱》中,作者毫不掩饰地以嘲讽的口吻发表自己对于非洲殖民地种族歧视政策的评论,似乎立场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对于种族歧视的批判态度,但是,这只是一种写作上的政治策略,是为了赢得读者而故意表露的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人道立场。而且,她成功了,她赢得了读者的赞誉,许多批评家都认为作家传达了一种伟大的反种族歧视的正义立场,认为作品中的摩西是一个正面的黑人形象,一反此前欧洲作家对非洲土著黑人的反面描写,为非洲黑人们树立了好的文学形象。事实正好与之相反,莱辛的根本立场并不是反对种族歧视,宣扬了种族歧视和合理性。“如在以前的全部历史中一样,作为胜利者而出现的人,无论是谁,都仍然参与今天的统治者在其受害者匍匐的身体上行进的凯旋行列。”^[16]如果说《野草在歌唱》中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宣扬还是在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歧视的面具下进行,使自己的作品获得一件正义的外衣,那么在后

来系列“太空小说”《南船星系的老人星座:档案》中,莱辛通过对殖民主义者的美化和神化,赤裸裸地表达了殖民主义诉求,公开宣扬了种族歧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早有评论者指出,“对于读者来说,最困难的是接受这样的思想:殖民主义是真正善良的种族关系,而且假如真的善良,它也是最好的一种种族关系。”^[17]

[参考文献]

- [1] [美] 亚当·史密斯. 张和龙译. “故事内容决定了讲故事的手法”——多丽丝·莱辛访谈[J]. 《多丽丝·莱辛特辑.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第(8)辑, 2008(1): 229-232.
- [2] 蒋花. 多丽丝·莱辛研究在中国[J]. 中国比较文学, 2008(3): 57-65.
- [3] 作从巨. “歌唱”或者“呻吟”: 说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J]. 名作欣赏, 2008(5): 109-112.
- [4] [英] 多丽丝·莱辛. 野草在歌唱[M]. 一蕾译. 译林出版社, 1999(10): 230.
- [5] [德] 马丁·海德格尔. 论真理的本质. 王作虹, 译. 存在与在[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129.
- [6] [美] W·C·布斯. 华明、胡苏晓、周宪译. 小说修辞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178.
- [7] Fishburn, Katherine. “The manichean allegories of Doris Lessing’s *The Grass Is Singing*” [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Bloomington: Winter 1994. Vol. 25, Iss. 4; pg. 1-17.
- [8] Fahim, S. Shadia; Doris Lessing: Sufi equilibrium and the form of the novel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44.
- [9] “The Persistent Personal Voice: Lessing in Rhodesia and Marxism” [M], interview with Eve Bertelsen, *Doris Lessing Newsletter*, 9, no. (Fall 1985), P8.
- [10] Fishburn, Katherine. “The Manichean allegories of Doris Lessing’s *The Grass Is Singing*” [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Bloomington: Winter 1994. Vol. 25, Iss. 4; pg. 1-17.
- [11] [法] 保罗·利科. 解释的冲突: 解释学文集[C]. 莫伟民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281.
- [12] [德] 卡尔·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转引自《东方学》[M]. 扉页.
- [13] [法] 罗兰·巴尔特著. 符号学原理: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C]. 李幼蒸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1988:60.

[14] [美]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5.

[15] Iyer, Nalini, Ph. D. "Masked fictions: English women writers and the narrative of empire" [M]. Major Professor: Margaret M. Rowe. Purdue University, 1993. P123.

[16] [德]瓦尔特·本雅明. 历史哲学论纲(VII). 转引自:[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政治无意识》

[M]. 王逢振、陈永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8.

[17] Whittaker, Ruth. Doris Lessing[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P100.

[18] 杨颖. 失衡的家庭,开化的人性[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1(6).

(责任编辑:朱德东)

On Doris Lessing's Racialism in the Grass Is Singing Through the Cracks of Narration

TAO Shu-qin^{1,2}

(1.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Beijing 100875;

2. Guizhou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Transmission, Guiyang 550003, China)

Abstract: The Grass Is Singing, written earliest by English writer Doris Lessing, was widely read as a righteous text about anti-colonialism and anti-racialism. But Lessing's true standpoint was betrayed by the three cracks in the text, the crack between subjective reviews and objective descriptions, the crack between idol-construct and idol-deconstruct, and the crack in the image of Mary, a white woman. Through these cracks, we can find Lessing is propagandizing raci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the text, because she come from a white colonial ruler family and this has a bad influence on her.

Key words: The Grass Is Singing; Doris Less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colonialism; the cracks of narration